

“开拓团”：日本妄图永久吞并中国东北的侵略工具

□ 孟月明

近代以来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一场蓄谋已久、步步为营的全面侵略战争，不只直接表现为战场上的军事占领，还有一套长期、系统、隐蔽的殖民同化方案。由日本国家层面推动的满蒙“开拓团”移民政策，是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永久吞并中国东北进而全面侵华的战略组成，是其实施人口置换、掠夺土地和战略资源的重要侵略工具。为此，日本政府开启了庞大的移民计划，历经试点移民、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三个阶段，持续40年之久。所谓“开拓”，并非单纯的人口迁徙与农业垦荒开发，而是有组织、有计划、分阶段实施的殖民侵略行为，给中华民族尤其是东北地区带来了沉重灾难。

蓄谋已久的日本移民侵略计划。近代以来，由于领土狭小和人口不断增长，日本一直急于解决其农村“过剩人口”和“土地饥饿”的矛盾，对中国东北广袤肥沃的黑土地觊觎已久，将其作为殖民移民的首要目标。1904年日本发动日俄战争，攫取沙俄在大连、旅顺的殖民权益，建立关东州，并控制了南满铁路。当时的首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（简称“满铁”）总裁后藤新平便提出：“能否使日本始终处于不败的优势地位，必须以移民为要务。”1913年，“满铁”开始从铁路沿线守备队中，选拔有农业经验的日本退役士兵进行移民试验，“除队兵”移民。1915年3月，关东州都督福岛安正在大连金州创建第一个移民试点村——“爱川村”。1928年4月，“满铁”组织大连农事株式会社进行试点移民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，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，为日本大规模移民殖民扫清了政治与军事障碍。在关东军主导下，日本统治集团达成共识：单纯依靠军队占领难以长久维持统治，只有大规模移民定居，改变中国东北人口结构、土地权属与基层社会形态，才能实现永久统治、彻底吞并东北的目标。1932年，关东军统治部制定了《移民方策案》《日本人移民案要纲》《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》，日本拓务省也形成了《满洲移民计划案》。这些方案的基本精神，是在10年到15年的时间内，分别向中国东北移入“屯田兵制移民”1万人和“国防移民”10万户。

1936年广田弘毅出任首相，建立了以军部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，

把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列为七大“基本国策”之一，出台《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》，提出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。此项计划之战略目的为掠夺东北优质土地与战略物资，支撑日本本土发展与对外战争；通过人口置换，改变当地民族构成，推行“日满一体”的殖民同化；在边境地带构建殖民防线，应对苏联，巩固占领区，为持续侵华和亚太扩张建立稳固后方。

步步蚕食中国东北。1932年至1935年为日本“武装移民”试验阶段。移民招募对象以日本“在乡军人”为主并按军队形式编组，配发武器，实行寓兵于农、屯垦驻防模式。1932年10月，首批492名武装移民抵达黑龙江省佳木斯市，次年春天进驻永丰镇，后更名为“弥荣村”。1932年至1936年间，日本陆续进行了五次“武装移民”，向桦川、依兰、绥棱、密山等地迁入2785户日本移民。移民配备枪械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，平日从事农业生产，战时配合日军清剿抗日武装，是日本武装殖民的初步试点。

1936年至1941年为日本“国策移民”大肆扩张阶段。依托“百万户移民国策”，日本推行集团移民、“分村分乡”、青少年义勇队移民三类模式。“分村移民”主要是通过诱骗、强制等手段将日本“过剩农家”送往中国东北的移民计划。同时大量招募15岁至19岁青年组建义勇队，经过短期军事训练派往中国东北，作为殖民后备力量。1939年12月，随着移民规模的扩大，为掩盖其侵略战争的本质，缓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，同时也为了欺骗日本人民积极参与移民侵略，日本颁布《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》，把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全部改称“开拓”。至1941年，东北境内已建成数百个“开拓团”，分布在黑龙江等主要农耕区和边境要道。

1942年至1945年，日本向东北移民进入战时收缩但仍强行推进的阶段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国力消耗严重，原定百万户移民目标无法完成，但土地掠夺政策并未停止。关东军制定“战时紧急开拓”方针政策，日本当局继续强征底层民众与未成年少年补充移民，持续抢占土地，扩张殖民据点。从1932年10月到1945年5月，日本在中国东北共设立860余个移民团，移民总数达到10.6万户32.3万人，殖民据点遍布东北

核心产粮区与战略通道。

戕害东北民众和服务侵略战争的双重罪责。日本“开拓团”落地生根，完全建立在掠夺土地、驱逐当地农民、残害百姓的基础之上，给东北人民造成深重灾难，留下大量血泪史实。日伪当局以“土地整理”“荒地回收”为名，强行征购东北农民世代耕种的熟地，却只给出极低的补偿价格。后期甚至采用武装力量直接夺占，打着“维持治安”的旗号，没收农民土地，或以“危险区”为名，将原居农民驱逐。这些措施破坏了东北农业经济良好的发展模式，使农村生产力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。截至1945年，日本在中国东北共掠夺移民用地达2600余万公顷。

为安置“开拓团”，日军推行“归屯并户”，焚毁原有村落，制造大片无人区。1934年12月3日，伪满洲国民政部发布了《关于集团部落建设之件》的第969号训令，强令伪满洲国境内的各省普遍推行“归屯并户”，强迫住在偏远山区的农民离开自己曾经世代居住的家园，迁往指定的“集团部落”。为安置日本“开拓团”，黑龙江省方正县伊汉通乡的两千余户当地居民，被强制驱赶迁往高寒贫瘠山区。寒冬时节，民众无房御寒、缺粮少柴，只能栖身地窖子，疫病、饥荒蔓延，部分村落人口死亡率过半，成为“开拓团”掠夺土地罪行的历史见证。

日本的“开拓团”从来就没有进行过所谓的“开拓”土地的活动，实际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。10余年间，超过500万东北农民失去土地家园，一部分沦为“开拓团”佃农，承受高额地租盘剥，一部分流离失所，丧失基本生存依托。在殖民压迫之下，东北民众的基本权利遭到践踏和剥夺。伪满政权配合“开拓团”实施民族歧视政策，规定中国人食用大米即构成所谓“经济犯罪”，粮食优先供给“开拓团”与日本关东军。中国人却只能食用粗粮糠菜，稍有反抗便遭到抓捕、酷刑与监禁。

“开拓团”并非普通农业移民群体，而是日本侵华战争体系的基层支撑力量，深度嵌入战争机器，承担军事、物资、治安多重功能。约半数“开拓团”部署在“开拓第一线地带”，直接面对苏联边境。从长白山、哈尔巴岭、老爷岭及大小兴安岭内侧至松辽平原外

缘一线，称作“开拓第二线地带”，这里的移民超过总数的40%。网格化布局的殖民村落，分割、孤立抗日根据地，切断民众与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系，压制东北抗日运动，维护伪满殖民统治秩序，成为巩固占领成果、持续推进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。

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“开拓团”成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主要兵力来源，青少年义勇军更是日本重要的预备兵源，持续向前线输送人力。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，共有8.6万余名15—18岁的“日本青少年义勇队”队员，被安置在中苏边境地区。在物资掠夺层面，“开拓团”占据东北肥沃黑土地，规模化生产粮食，产出优先供给关东军、军需储备并大量调往日本本土，实现以农养战，持续为侵华战争输送物资。

1945年8月，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，日本以“开拓团”为主要载体实施的百万户移民计划，最终沦为泡影。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永久占领东北的殖民幻想，彻底破灭。当时，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传达“可以放弃满洲全土”的命令，只优先将日本军人、军队文职人员和家属送回日本。“开拓团”仅剩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被遗弃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弃子和对外侵略的牺牲品。4000余名“日本遗孤”被遗弃在中国东北，后来由善良的中国父母抚养长大成人。

从黑土地上这段沉重的殖民往事可以清晰地看出，日本“开拓团”本质是殖民扩张团，其侵略属性与历史罪行不容美化、篡改与淡化。它同时也警示世人：日本侵华战争从来不只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，在抢占土地基础上的人口置换和社会同化，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更为隐蔽、更具长期性的卑劣手段。唯有始终以史为鉴、警钟长鸣，深刻认清清军国主义的全面扩张本性，守护好民族集体记忆，才能筑牢思想防线，坚定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，让历史悲剧永不重演。

（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）



向高端跃升。

坚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发展先进制造业

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。坚持系统观念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，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。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，并不忽视和轻视农业、传统制造业、现代服务业、基础设施等产业的作用，反而需要发挥先进制造业的骨干支撑和关联引领作用，承接科技创新、提供现代化生产资料、牵引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，为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空间。必须坚持系统观念，统筹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、传统和新兴、政府和市场、发展和安全，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，构建具有完整性、先进性、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。

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。先进制造业发展关键靠创新，走好创新这步先手棋，就能占领先机、赢得优势。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，依托国家实验室、重点实验室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、中央科研院所、科技领军企业、新型研发机构，构建多层次、全链条创新体系。坚持企业主体，聚焦高端装备、核心芯片、工业软件、关键材料、精密仪器等“卡脖子”领域，集中优势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强化基础研究前瞻布局，补齐工业基础短板。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，打通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、中试转化、产业化落地全链条，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。

统筹传统产业升级、新兴产业壮大、未来产业前瞻布局。传统产业不是落后产业，不能简单一关了之，要通过智能化、绿色化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迭代

升级，释放产业发展新活力。人工智能、航空航天、生物医药、高端装备、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正处于从培育到壮大的关键阶段，必须从技术攻关、主体培育、产业生态、要素保障、制度改革等多维度系统发力，补短板、延链条、提能级，打造产业增长新引擎。未来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增量，必须抢抓产业发展新机遇，前瞻布局量子科技、生物制造、氢能 and 核聚变能、脑机接口、具身智能、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，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。

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核心问题，也是先进制造业由大到强过程中必须回答好的问题。实践告诉我们，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形式，但市场自身也会失灵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。既要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，培育链主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和单项冠军，又要完善产业治理，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、内卷式恶性竞争，完善标准、产能预警、落后产能出清机制，实现放活与管好相统一。

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。发展和安全犹如硬币的两面，相互支持、相互促进、高度融合，必须在发展中国安全、在安全中谋发展。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监测、风险预警、应急保供机制，针对重点产业链建立风险清单、短板清单、攻关清单，分类施策破解断链风险。推动关键核心产品、基础材料、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替代，构建多元韧性供应链体系。纵深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，补齐短板弱项，提升产业链抗冲击、抗风险、稳供给能力，牢牢守住产业安全底线。

（作者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）

以跨文化视角讲述长征故事

□ 张德明

魏华德（Harold Weldon），澳大利亚汉学家、出版家，长期致力于中澳文化交流。他在1985年、2011年两次重走长征路，以跨文化视角讲述长征故事，以长征主题影像出版为核心载体，用海外受众易于接受的视觉叙事，向西方社会传播中国历史与当代发展。2017年，魏华德荣获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，这一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，正是对他数十年深耕中国故事传播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认可。

初征：感悟长征这段东方传奇。1985年，19岁的魏华德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，开启了重走长征路的旅程。他从江西瑞金出发，途经遵义、皎平渡、大渡河、夹金山，最终抵达陕西吴起镇，魏华德与外宾摄影师团队历时数月，用脚步、车轮与镜头记录沿途的山川地貌、人文风情。这段旅程让他刻骨铭心：在皎平渡，他中暑晕倒，是当地村民用清水与西瓜救了他；在藏区草原，牧民们用牦牛奶与热饭招待陌生的西方来客；在偏远村落，淳朴的百姓即便生活清贫，也愿意拿出最好的食物分享。魏华德回顾一路走来的历程说道：“虽然长征是关于红军的故事，但我们发现，它能向整个世界展示美丽的中国。中国不仅有稻田，还有连绵的山脉、特色的民族、优美的地理环境以及丰富的文化。”

魏华德发现，红军一路走来始终善待民众、守护百姓，用真诚换来了群众的支持，这种“以民为本”的信念，正是长征穿越艰难险阻的核心密码。而沿途百姓的善良与坚韧，更让他打破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，读懂了中国刻在骨子里的团结与友善。他谈道：“长征是战胜逆境、坚韧不拔、团结奋进的伟大历程。重走长征路教会了我无所畏惧，永远以坚定不移的决心面对挑战，以及良好的适应能力——接受新的策略，探索未知的路线，接受新的想法，接受陌生人的好意。”

这次旅程后，魏华德在1986年主导出版了大型画册《中国——长征》，以中、英、法、德、日、意、西7种语言在全球五十多个国家售出15万册，取得巨大成功。这本画册没有刻意渲染宏大叙事，而是用真实的影像、细腻的文字，展现长征路上的自然风光、民族文化与普通人的生活，让西方读者第一次看到，长征不仅是军事征程，更是一段充满人性温度、文明魅力的东方传奇。魏华德说：“这本书不只是讲历史，更是借长征路线，展示中国广袤国土、多元民族、壮丽山河，让海外读者看见教科书之外完整的中国。”

再征：见证长征沿途的沧桑巨变。2011年，在红军长征胜利75周年之际，魏华德决定组织中外摄影师第二次重走长征路，重新观察沿线的变化，并计划再次制作主题画册。魏华德这样解释创作构思：“单纯讲述八十多年前的战争历史，海外年轻读者会产生距离感；把长征历史和今天百姓的美好生活放在同一本书里，读者才能读懂——当年红军为之奋斗的理想，正在这片土地上变成现实。”对于第二次重走长征路，他认为核心意义就在于重访他们上次所走过的那些历史地点，记录这些地方社会和经济方面发生的变革，并记录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两次跋涉，岁月流转，长征沿线的巨变让他惊叹，百姓生活日新月异。但让他更为动容的是，变的是时代风貌，不变的是长征精神与人间温情。当年帮助过他的村民，如今依旧热情好客；长征沿途的红色遗址，成为传承精神的重要载体；中国人面对困难不言弃、团结奋进的品质，始终未曾改变。第二次重走长征路，魏华德切身体会到了许多变化：当时基础设施已然更新，沿着长征路线经过大渡河时，那里新建了许多水坝。1985年，四川西部地区很难买到水果和蔬菜，但故地重游的他发现，漂亮的市场和商店里满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农产品。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交通基础设施的惊人发展。高速公路、火车站、高铁和机场

相互连接、纵横交错，让人惊叹。

魏华德将第二次长征之行后出版的画册命名为《中国——新长征》，画册以中、英、德、法、西、俄、日等多语种出版，于2012年面向全世界发行。画册以长征为主线，记录和报道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“新长征”，用图文、纪录片、数字网络出版等多种形式，向全世界重点介绍改革开放以来长征沿途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，在经济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。画册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，被海外出版社誉为“了解中国西部社会形态和中国精神世界的窗口”。

长征是读懂当代中国的纽带。深耕中国研究四十载，魏华德始终致力于“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”，打破跨文化传播的壁垒。他深知，西方受众对宏大叙事的接受度有限，而真实的细节、鲜活的人物、共情的情感，才是跨越文化隔阂的关键。红军长征的故事无疑是读懂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载体。

在世界中国学大会、北京文化论坛等国际交流平台，他以亲身经分享长征感悟，呼吁国际社会摒弃意识形态偏见，以客观、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，通过长征这样的经典故事，探寻中国发展的精神密码，理解中国选择的道路与价值。同时，他也鼓励中国文化传播者，坚持用跨文化的视角打磨故事，让更多中国故事像长征一样，走进西方读者的心中。

在魏华德看来，长征精神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，乐意向世界讲述长征这一体现人类毅力、领导力与战略智慧的史诗故事。对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，他表示：“今天的中国对自身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充满自信。西方需要理解，这种自信来自中国发展历程中的‘长征’，并非一蹴而就。我相信，一个自信的国家既会拥抱自身身份和价值观，同时又积极与其他国家合作，以相互尊重为基础，共同应对全球挑战。”

两次重走长征路，魏华德用双脚丈量中国土地，用心灵感受中国温度。他出版的画册，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、立体、全面的中国；他搭建的文化桥梁，让中澳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。在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浪潮中，魏华德如同一位执着的行者，以长征故事为纽带，让世界看见中国的精神与力量，让中国的声音传遍全球。

